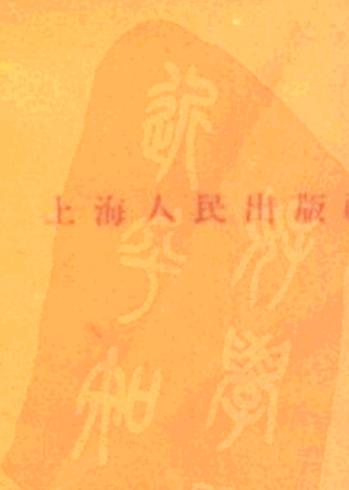




論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

黃澄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PDG

L124·1

2

1958年，我国出現了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这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共同創造出来的偉大成果，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一切过去連想也不敢想的現在都一一实现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拥护正义的人民，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这一个大跃进；因为这一个大跃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也关系到全世界和平与民主力量的增长。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喜欢这一个大跃进，他们企圖否认它、污蔑它；但最終也不得不承认它，因为这是铁一般的事實。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顛倒黑白企圖否认和污蔑我们的大跃进，同时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人民公社，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从来对于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任何进展，都是憎恨的、诅咒的，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場；因为我们的前进，就意味着他们的没落，我们的胜利，就注定了他们的死亡。可是在我们队伍中，也有人对大跃进采取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他们認為我们的大跃进不是正常的現象，他們認為在我们經濟建設中大搞群众运动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会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会造成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紧张局势；而且認為大跃进由于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因而是不能持久

的等等。这些謬論几乎和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如果让它们肆无忌惮地贩卖下去，无疑地要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破坏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貫彻执行，要阻碍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断前进，而且还会在一部分思想不够坚定的人们中找到市場，这是我们当前思想領域中的最主要的危險。因此，我们必须及时予以反击，对这些錯誤論点予以批駁，把某些混乱思想加以澄清，这是我们当前保卫党的总路綫的重大任务之一。为了保卫总路綫，坚持继续大跃进，批駁錯誤論点与澄清混乱思想，首先就要求我们自己更好地学习和认识总路綫，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大跃进。

(一)

国民经济大跃进，是高速度发展的飞跃形式。談大跃进，要先从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談起。沒有解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就沒有 1958 年的大跃进。我们知道：建設速度問題，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这是客觀形势和客觀条件所决定了的。特别是在原来經濟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設社会主义，更需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首先，社会主义政权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在资本主义廢墟之上建立起来的，为了保証工人阶级政权的巩固，必須迅速建立強固的經濟基础，沒有强固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上层建筑；其次，工人阶级

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同社会主义建設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必須抓紧时机迅速发展生产、繁荣經濟，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这样，才既能适当满足解放后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量需要。再其次，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为了保証社会主义陣營在与資本主义陣營的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并且赢得时间以爭取持久和平与消灭战争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必須以比先进資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速度与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高速度发展国民經濟就不仅是一个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問題，而且是关系到全世界革命前途的問題。

社会主义国家以高速度发展国民經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消灭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特別是改变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由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規律的作用，就能充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加以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国民經濟計劃化的，沒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經濟危机，可以保証决定高速度的各种主要因素如人力（劳动）、物力（資源）、財力（資金）和技术条件（科学文化）等得到最充分最合理的利用。同时，摆脱了被剥削和被奴役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可以大大发揚主动性、积极性、創造性，从而开展劳动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經濟的最

基本的动力。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协作与相互支援，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需要与可能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必然性，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也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即以最近五年（1954—1958年）来看，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而资本主义世界还不到3%。苏联从1929年到1955年，工业产值增加了二十倍以上。若单以1958年的工业产量而言，波兰比战前提高了四、五倍以上，捷克提高了二·三倍，匈牙利提高了三倍，保加利亚提高了大约八倍，阿尔巴尼亚提高了十七倍，等等。而美国在战后却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特别是1958年工业生产比1957年下降了6.5%。至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则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从1950年到1958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8%，而美国是3.7%，英国是2.9%。在我国工业特大跃进的195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比1957年增长了66%，而美国、英国都在下降。由此可见，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规律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它没有停滞与下降。

不过，社会主义生产每年增长的幅度，由于条件不同，不是全部相同而是波浪式前进的；增长率有时高一些，有时较低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国民经济总是不断增长的。由于在整个高速度发展的生产运动过程中，生产条件在不断改变，人们的

觉悟在不断提高，生产的潜力是会不断地成长和积累的。只要我们不断挖掘潜力，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组织和运用这些潜力，这些潜力就会象核子爆发一样发挥出它们的威力，在生产上形成跃进、大跃进或特大的跃进。我国在 1958 年就出现了空前大跃进的局面，这一年，无论是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品流转以及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了其中增长最快的年份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而且这种跃进的局面，在 1959 年还继续发展着。这个大跃进的结果，把我国经济建设推向了新的高潮，我们从工农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可以看出来：按照调整以后的 1959 年的计划指标，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 1949 年增长四·三倍；钢产量将达到 1,200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七十五倍；煤产量将达到 33,500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九倍多；粮食产量将达到 5,500 亿斤，比 1949 年增长一倍半；棉花产量将达到 4,620 万担，比 1949 年增长四·二倍；等等。工农业生产象这样飞快地增长，算不算高速度发展？算不算大跃进？完全可以肯定，是高速度发展，是大跃进；而 1958 年不但是高速度、大跃进，而且是特大的跃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硬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闭着眼睛说胡话，这正是他们色厉内荏的表现。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是：1958 年我国钢、生铁、原煤等产品增长的绝对量，美国过去分别用了五年、四年和十四年，英国则分别用了十一年、二十九年和三十五年才能达到。请看，谁是高速

度大跃进？谁是低速度大跃退？事实胜于雄辩。高速度大跃进的是我们，低速度大跃退的是号称先进的美、英帝国主义国家。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承认大跃进，他们的悲剧在于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成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应声虫。

(二)

1958年大跃进局面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的。由于我们党和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而就能够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制定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在党的领导下，用正确的路线与政策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武装起来，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力量，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当党的路线与政策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就会显出万丈光芒和无比的威力。我国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大跃进局面的出现，就是最典型的范例。我们党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已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1955年冬季，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多快好省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接着，提出了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以上各项，都为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大跃进，

不断开辟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进行的经验的初步总结，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当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旦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就出现了。所以，我国的大跃进绝不是突如其来，应该说，它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根据我国人民要求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和愿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与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群众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战斗姿态努力奋斗的伟大成果。

我们说大跃进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由于：首先，大跃进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必然要实现的，人民要办的事，谁也不能抵抗；人民不要办的事，谁也不能办成功。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而又“一穷二白”的大国，我国人民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和剥削制度的残酷榨取与压迫之下，过着饥饿、穷困和没有文化的奴隶生活，所以要求革命，要求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使自己站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从而建立世世代代的和平幸福生活。当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

得了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改变了生产关系以后，全国人民唯一的意志和愿望就是着手建設自己的国家，为子子孙孙建立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打下坚强的基础。由于我国广大人民从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从历史以及自己亲身的經驗中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就是已經取得了革命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也仍然不能改变飢饿、穷困和沒有文化的生活，而且連政权也还不能巩固，当然也就談不到永久和平幸福生活的建立了。因此，解放了的我国人民具有迅速建設社会主义的强烈意志和愿望，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建設社会主义，是在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家底子很薄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所遇到的問題当然比一般經濟基础较厚的国家所遇到的要多得多。但是，正是由于人口众多，只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覺悟，把所有的人力都动员起来，那么就能众志成城，人定胜天，无往而不胜利；人，解放了的人，它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它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正是由于“穷”，为了摆脱“穷”，人民的决心就大，干勁也就特别足。正是由于“白”，人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来进行建設；各方面的潜力就特別大，人民可以充分挖掘潜力和利用沒有被开发的資源。正是由于家底子薄，人们就会知道勤儉建国、勤儉办一切企业和事業、勤儉持家，大家就会认真地实行增产节约。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多议論多，熱氣高，干勁大。”“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看起来好象是对社会主义建設不利的条件，但事实上，由于人民具有迅速建設社会主义的强烈意志和愿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由于我们的党是始终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而且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就能正确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就能根据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制定正确的路线，就能用正确的路线来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实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是符合于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状态的意志和愿望的；正因为如此，就能鼓起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以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不計报酬地夜以继日地苦干、实干、巧干。这是 1958 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和持续跃进局面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这一点，概括地说，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解除旧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之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否認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说什么人民群众的忘我劳动“不是出于自觉”云云，这是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极大污蔑。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革命和建設事业中的群众运动，把人民群众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創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也是十分荒謬的。实际上，他们是在公然反对在革命和建設事业中走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唯我主义，他们以个人的感觉以及个人的、狭

险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来观察世界，因而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对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和改造世界运动中的作用，有着与无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当然谈不到依靠群众；而且他们十分害怕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去支持，去站在群众的行列当中领导他们奔向偉大的目标，而是被群众运动吓得心惊胆战，总以为它会出“乱子”，总是站在一旁袖手划脚，在群众头上泼冷水，甚至站在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与群众运动相抵抗。无产阶级则完全相反，他们永远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并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的意志和愿望而奋斗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分野。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大跃进，是符合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同时，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客观情况和形势有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并对主观条件作了正确的估量，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足够的估价。因而，大跃进的结果和成绩十分显著。这就有力地证明，我们的大跃进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些污蔑群众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恰恰是他们自己，才真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具有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狂热病，根本不相信人民群众，因而他们看不到：当人民群众已經覺醒、把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的時候，当他们已經认识到党的路綫的正确性的时候，当他们已經认识到只要貫徹执行总路綫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时候，就会意气风发，斗志昂揚，不計報酬，廢寢忘餐，不顧一切艰难困苦，挾泰山超北海，投入火热的斗争，从而发生无比的力量；他们更不能理解，这正是已經解放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这就是人民群众以不断革命的精神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表現。

其次，国民经济大跃进，也是我国政治、經濟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形势所造成并且是这种形势的集中表現。这是另一个重要依据。我国人民具有要求迅速摆脫我国穷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意志和愿望，并愿意为实现这一意志和愿望而斗争。但人们要把愿望变成現實，还需要具备客觀条件。人们的主觀能动作用可以創造客觀条件，促使客觀条件尽量发展，同时一定的客觀条件，又可以促进人们进一步发挥主觀能动作用，加速改造世界的进程。这就是事物运动的客觀規律。大跃进就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努力奋斗而取得的产物，也就是党和国家把人民群众的主觀能动性和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觀可能性正确结合起来的結果。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做了不少工作，使我国政治、經濟和科学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量的积累，在一定情况下就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在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产生

的 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59 年继续跃进的局面。我们所说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彻底，社会生产力的空前解放。1949 年我国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就立即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一面把民主革命未完的任务彻底完成，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工作。1952 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并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个体经济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解决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状况的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为了解决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又于 1957 年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民主革命彻底完成于前，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进行于后，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由于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要求，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这就使过去几千年沉睡着的社会生产力苏醒过来，并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特别是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的相互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这些重大的政治发展和变化，不能不

带来人们的社会主义干劲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由此而促进了大跃进的到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彻底解放，具有迅速建設社会主义的愿望，这种愿望必然要表现为积极行动，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的源泉，这就是能够持续大跃进的动力。

第二，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超额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就以空前的速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34.8%，农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的水平。在此基础上，1953 年就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要求，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建設，并在 1957 年大大超额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超额完成，使我国工业化有了初步基础，重工业有了較大的发展，并初步改变了工农业、重輕工业的比重，为我国进一步工业化創造了较多的物质技术条件。更重要的，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不少的經驗教訓，发现了我国經濟資源方面的无穷潜力，特别是逐步认识和証实了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这些經濟建設的重大发展，是我国大跃进的客观基础之一。尤有进者，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了 18%，最高年份达到 30.2%，已經显示了高速度发展的极大可能性，它不仅带来了全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心，而且为大跃进建立了客观依据。

第三，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是在党的总路綫光辉照耀下的两大成果，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农业生产跃进和大搞农田水利运动，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跃进；

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又推动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就是以这样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反复过程实现的。由于人民公社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更大的优越性，它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并具有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等特点，它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事业，便于加强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的综合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提高，便于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在分配中有一定的供给制成分，等等，所有这些优越性，将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因而，它的发展不仅符合于五亿农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找到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而且通过农民自己的生产和革命斗争的实践，找到了一条便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发挥了他们在生产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挖掘了农业生产中的潜力，由此带来了农村生产和建设的大跃进，由此又推动了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推动了全面大跃进局面的出现。

第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经过解放以来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的科学文化队伍有了很大的增长，对生产建设事业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科学技术指导力量。1957年

党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年党又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揚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对于生产建設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由于实行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出現了无数的发明与創造。如在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有的成倍、成几十倍地增长，大量新产品在不断制造出来，并继续向高、精、大、尖的方向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不断出現了高额丰产的新纪录。整风以后，工厂内实行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結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过时的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又使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和結合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机会。这一切的发展，都不能不有助于1958年大跃进和持续跃进局面的出現。

第五，人口众多、資源丰富等有利因素的充分发挥。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和产生这种制度的根源以后，我国六亿多人民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发挥，长期未被开发的丰富的自然資源逐步得到了开发，这就为我国的生产大跃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我国六亿多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以后，又使我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阔的國內市場，給我国提供了經濟飞跃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第六，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援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資本主义阵营日益削

弱，东风日益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一天天地烂下去，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有力的政治保证。加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正在共同高涨，建设经验日益丰富，而他们又不断地给予我们不少建设经验的指导和技术力量的援助，无疑地，这也是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大跃进的客观条件之一。

再次，大跃进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的结果。大跃进的局面，不仅由于它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和愿望，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形势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的伟大成果。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着中国具体建设实践的特点而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原理，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理，以及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原理，特别是关于扩大再生产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理，对于我国如何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建设社会主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和毛主席认识到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穷困落后状况的意志和愿望，认识到我国以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可能性，同时又紧紧地掌握